

John Dunn, ed.

[英] 约翰·邓恩 编

林猛 等译



人文
译丛



民主的历程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 BC to AD 1993

吉林人民出版社

D082

29

8103124

D105/05

人文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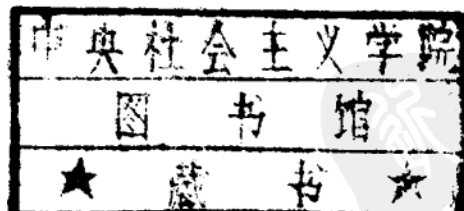
民主的历程

公元前 508—1999 年

[英] 约翰·邓恩 编
林猛等 译



201031249



吉林人民出版社

PDF

ISBN 7-206-03407-1

(吉)新登字 01 号

吉林省版权登记

图字:07—2000—367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吉林人民出版社所有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民主的历程

编 著 [英]约翰·邓恩

译 者 林 猛等

责任编辑 崔文辉

责任校对 蔡守国

封面设计 叁陌工作室

版式设计 小叶子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407-1/B·103

定 价 13.5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PDF

出版说明

诚如中国的专制统治持续两千年而不衰，民主体制在西方，也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制度。然而在古代希腊，民主更多的是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权宜之计；近代学者也不断指出，古典的民主观念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多有貌合神离之处。然而追溯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源流，仍需从古希腊的民主尝试入手；而由此开始，探索民主体制和民主理念演进的历程，一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焦点之一。

本书是一批西方著名学者探讨民主体制这一“未完成的历程”的一次成功努力。该书的特点，在于由政治史各阶段研究的权威专家分别撰写其所擅长的领域。这样固带来体例与行文差异的弱点，然奉献给读者的却不失当代民主研究的最杰出进展，我们看到，除去本书主编，研究洛克政治思想的权威 John Dunn 而外，撰稿人中尚包括 Quentin Skinner（他的名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曾在我国翻译出版）、Biancamaria Fontana（她编选的贡斯当文集激发起学界的极大兴趣）、Neil Harding（他分析列宁政治思想的两卷本著作是此一领域的权威之作）等一批顶尖的专家学者，可见其学术价值之高，是绝对不容忽

视的。将这样代表西方当今学术最新进展的著作译介绍给中国学界，必将推动对于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深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纵然学术价值极高，毕竟代表的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其中不乏与我们的认识相差之处。因此，我们将 Neil Harding 论苏俄政治体制发展史的全文删去，对各位作者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不实之词，也做了删节或技术处理。尽管如此，全书强烈的西方理论色彩和价值判断依然存在，望读者鉴别批判。

本书是由北京大学的一批青年学者协力翻译的。其组织协调及全书统稿，均由林猛先生完成，我要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原 序

一个古老却没有失去活力的观念认为，人类政治社会应当由普通人（即成年公民），而不是由超人统治。虽然，这不是对我们生活世界真实状况的合理描述，但它却成为衡量世界应当如何的主导观念。本书所论，即是它的历史和意义。这个观念，自身意思十分清楚，但它的奇怪悖理，却让人无法泰然处之。本书即试图抓住这两方面，进而判断两者的关系对于今天与未来的人们的含意。书中会告诉读者，这个观念是如何产生并受到压制、而后又得到传播和重新解释，如何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不时改变着人类社会，同时自身又受到社会现实的改变的。

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城邦小国雅典对城邦内部的政治安排作了一系列调整。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只是针对长期的地方性的问题作出的纯粹地方性的反应。他不是要针对什么是政治和社会的善，为人类、甚或只是为希腊人，引入、实践一个前后一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般概念。克利斯提尼的同时代人也不可能想象到，他的改革开创了一种政体形式，后来竟成为各个民族政治合法性的基准，一个事实上不可动摇的基准。

民主是非常简单的观念，无论它的诉求、力量，还是它那些严格的、无法消除的限制，都是如此。本书要讲述、要解释的，正是它非同寻常的政治历程。为此，我们试图首先告诉读

者，希腊城邦最早的民主制度的真实情况：它们如何产生，如何运行，如何随着时间发生改变，原因何在。我们还探讨，希腊人如何理解它们的力量和缺陷，而这些力量和缺陷，对于希腊人在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政治理论、认识论、生物学等许多方面思维的活力与远见，是如何有助于它们的形成的。我们还试图确定，这么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思想，仅仅产生了两个世纪之后，在政治上就轻易被扑灭了，这是为什么？还有，随后的两千多年，不只是希腊的历史，还包括其他所有文明社会，多数时候民主思想都完全被扼杀，这是为什么？这个政治概念，饱受压制和指责后却会再度在各种场合出现，而且，过去两个半世纪它再度出现的时候，它的精力、它的专断，总是有增无减，这又是为什么？而我们最为要紧的是理解，为什么它最近赢得的胜利竟是这么突如其来，它在某些方面今天给人的感觉竟是这么势不可挡，几乎一统天下？同时我们也应当努力探求，这种不可阻挡的胜利，为什么在许多方面竟是这么空洞，与思想本身的强大、简洁、诱人总是相去如此之远？

俯瞰民主 2500 年的历史，非常之有戏剧性，它时而使人鼓舞，时而让人寒心。但如果我们审视的目光更多一些专注，而少一些热烈的情绪，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要旨首要表现在它的无可救药的平凡，表现在它着意要把共同体的生活加以驯化并一以贯之的意愿（某种程度上也是能力）。这个观念之所以强大、诱人，是因为它许诺给共同体它自身所向往、所选择的東西，使人类共享的社会与政治存在，变为一种意图明确的共同行动结构。民主制度底下决定未来行动的，是它的人民，是组成它的人们；由此，他们牢牢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民主所以强大、诱人，乃在于一种自治的观念，即应当听由个人自由的

选择。

这个简单的观念，在古希腊可以视为对现实政治生活大致不差的描述，虽然范围也许有所限制。现代国家，姑且不论如何口是心非，它的人民的概念却比雅典人宽泛得多：没有了奴隶制度，女性也被慷慨地包括在内。但是，所有的现代国家，都不是由其成员来决定未来行动，他们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民主以各种形态与我们发生实际的关联，这里，民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远为复杂，进而，它显然不是那么受欢迎，不是那么清楚明了，诚实可靠，那么让人流连忘返。赢得最近这场突如其来、令人难忘的胜利的，是其中一种更为实用、但魅力稍逊的形式：现代立宪国家的代议制民主。今天，现代民主制度实际的力量正来自它的完全的朴实无华，尤其是它对我们生活的经济世界特殊的适应能力。这些制度的前景，与过去的时候一样，仍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如果我们希望理解现代民主生活的各种危机与机遇，我们需要懂得这个简单的观念古怪而矛盾的过去，它那持续不断的力量的源泉所在，以及人们对它怀疑、不满的根据——自它产生之日起，这种情绪一直挥之不去。最终，这种不满、怀疑的矛头所指是人类的自由本身：各种让人望而生畏的实现自由的阻碍，各种因它而起、时有发生威胁——要消除这些威胁，除非限制自由，甚或完全取缔自由。对个人自由（包括自己的自由）毫无戒心，这可谓愚蠢之极。但是，各个社会必须行动。人类未来面临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十分棘手，眼下还看不分明，有鉴于此，目前我们共同的、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学会如何齐心协力，使行动更有成效。对待民主，一种坦率的态度即意味着对任何公民的不信任；但细细观察之下，有人之所以对民主抱有敌意，其中往往

包含对其他人类社团相当的天真态度。假以时日，这种态度必会证明，它至少同样不足为信。一切行动都有风险；但与无所行动招致的风险相比，这种风险便可以忽略了。

我要感谢埃莱妮·丘比特，她最早善意地促成本书的创作；感谢迈克尔·库斯托夫，与他的两次交谈让我受到鼓舞，感到兴奋；感谢露丝·米斯格在耶鲁提供的帮助；感谢基姆·斯科特·沃尔温、蒂姆·巴顿以及其他牛津出版社的人员在整个过程中给予的许多鼓励，以及他们表现的效率；最后，感谢各位作者的耐心。

约翰·邓恩

于耶鲁大学，1991年12月



目 录

原序	1
第一章 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西蒙·霍恩布洛尔	1
第二章 古希腊政治理论：对民主的回应	
辛西娅·法勒	21
第三章 古希腊的民主、哲学和科学	
G. E. R. 劳埃德	51
第四章 意大利城市共和国	
昆廷·斯金纳	69
第五章 平等派	
大卫·伍顿	84
第六章 民主与美国革命	
戈登·伍德	110
第七章 民主与法国大革命	
比安卡玛利亚·丰塔纳	128
第八章 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主	
查尔斯·S·迈耶	148
第九章 印度的民主历程	
苏尼尔·基尔纳尼	184
第十章 丧失信仰：女权主义与民主	
苏珊·门德斯	204
第十一章 1989年的东欧：“回归常态”的立宪	

代议民主?	
尼尔·阿舍森	221
第十二章 结论	
约翰·邓恩	237
进一步阅读书目	272
译者后记	290



第一章

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西蒙·霍恩布洛尔^①

颇有争议的一个观点以为，欧洲民主史的起点是斯巴达而非雅典，这与通常我们把伯里克利的雅典看作“开放社会”的代表，——这当然是一种简化，——而把斯巴达看作它的对立面的观点相矛盾。但是，青年时期的斯巴达还不是它以后长成的极权主义怪兽的模样。有一份法律文件，它的日期和含义都是古希腊史研究中争论最剧烈的一处地方，其中规定，每隔一段时间，就当举行一次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第六章）。即使把它的时间作最大胆的推延，算到公元前600年左右，那也在雅典人之前：雅典人直到公元前508年或公元前507年克利斯提尼的时代，才有条文对定期的公民大会作了规定。这份文件看来还提到某种古代议事会（probouleutic council），各种事项付交作更一般的表决之前，都

^① Simon Hornblower, 牛津奥里尔学院研究员, 牛津大学古代史讲师。著作包括: *The Greek World, 479–323 BC* (Routledge, 1991), *Thucydides* (Duckworth, 1987),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I: Books I–III* (OUP, 1991)。

由它先做讨论。这一制度被誉为“斯巴达为统治之道作出的贡献”；它确有几处暗指人民主权，有一处可能还是明文的规定。但是，早期斯巴达的许多情况并不为我们所知，而且，无论如何，它早熟的政治成就却是被社会经济因素所扼杀（这已经不是我们关注的话题）。因而，对我们真正有意义的还是雅典人，他们的政治革新在时间上几乎同样久远，却远比斯巴达深入。一系列的改革秩序井然，又让人应接不暇；最后形成的参与式民主，把政治细节上的复杂老练（包括对个人责任的严肃态度）和几近彻底的非职业化原则集于一身，至今无出其右。

不过，在考察雅典人之前，不妨问问，欧洲，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是否就是一切民主制的源头？近来对“希腊中心论”、“希腊超常说”等等的反拨，不只是对古典学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欧洲意识和反闪族主义的一种时髦的反动：我们有很慎重的理由认为（Bernal 1987, 1991），传统上给予希腊人的荣誉，有一部分应该计在腓尼基人头上；西亚的腓尼基人，不乏可与古代希腊的自治城邦相媲美的东西。既然我们业已承认希腊人的字母表、殖民手段，甚至可能还包括城邦概念本身，都得自腓尼基人，那么，倘若最受推崇的某些雅典制度也果真来自腓尼基人，我们当有同样的心理准备。但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几乎还未起步，这使我们对待腓尼基人只能像对待斯巴达人那样，略为一提之后就继续前行。

即使承认希腊人领先，那么，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民主会在那里出现？虽然我们不抱答复的希望，但我们仍要提出这个问题。有一种非常有趣的解释，依据的是所谓年龄—阶级（age—classes）的概念（Sallares 1991: 181 以下）：这种制度，人类学家都非常熟悉，它内部的政治权利严格按照年龄分配。以此为基准的社会分层，起源上往往具有军事性质；而早

期希腊人（事实上还有罗马人）的国家，实际上正是这种结构，并保持不变。在希腊，继早期世袭贵族制后，政治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早期的僭主制。僭主的产生，是由于某些人——通常都是年轻人——在体育或军事上才能非凡，享有盛誉，便以此索要由于年龄所限而无法享有的权利，进而又以武力实现这一要求。一旦这种观点为人们认可，年龄—阶级的界限可以用种种的方法超越，那么，就理论上而论，这距离一种更一般的观点，认为权利的分配应当与年龄无关，就只有一步之遥；而在其他古代社会，权利只限于绝对君主或者上层贵族、祭司，民主这把楔子无缝可钻。这种一般理论很是讨人喜欢；假使能有证据显示，在民主的发源地雅典，年龄—阶级式的分层在现实生活中确有重要的地位，那它倒是不乏说服力。但目前，“为什么是希腊”的问题仍悬而未决，除非我们诉诸国民性作解释，但这早已过时。

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是雅典人”，就更难从什么理论公式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我们需要看一看公元前六世纪早期的雅典和阿提卡，正是在这里，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改革者——梭伦，在公元前 594 年进行了变法。（阿提卡是雅典周边地区的总称，它和雅典城都是雅典城邦的组成部分。）

雅典实行民主制的前提是它的“农奴解放运动”。在公元前 600 年左右，阿提卡的农业劳动人口生存条件极为恶劣。有一项为雅典所独有的制度，它的起源和历史尚无定论，但其中自愿的成分很可能要多于某种自然债务（involuntary debt）的成分，它规定，占多数的平民必须把土地出产的六分之一交给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显然人们一度忍受了这一制度；但后来，也许由于公元前八世纪和公元前七世纪新出现的海外殖民现象造成了财富的差异，这样的局面难以维系。“少数”通过殖民

而享尽奢华，同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鸿沟日益加深；生活极为严酷，一旦无法支付“六一税”就会沦为奴隶。梭伦废除了这种以人身安全作担保的，导致奴隶制的借贷，像他一首最著名的诗里写的，“解放了黑土地”。

这项废奴法案称为“解负令”，是梭伦采取的主要经济改革措施。讲究条理的学者总是把梭伦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然而经济改革却是一切事情的基础：正是由于它才造成了一种排他性的“公民精英”心态。这种排他性，随着民主的增长而增长：为外邦人获取公民资格而设置的门槛，随着雅典历史的发展而越来越高。

这种公民精英的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解放土地”的说法只是一个隐喻。如果把隐喻点破，问一问自由的黑土地有什么变化，比如说，现在谁是它的主人，那么回答是，从前的六一汉们现在拥有了这片以往为别人而耕作的土地。事实上，梭伦创造了一个小农的阿提卡：这些人不只是公民精英，而且还是一支自信的军事力量，他们知道，保卫阿提卡的责任就落在他们身上。在军事上他们被称作“重装步兵”（hoplites），这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一项革新，代表了一种更高程度的联合作战方式。事实上，有一种解释是，梭伦所说的“经济危机”可能根本不是经济危机，而是需要解决的自尊和团结的问题。在梭伦的时代，这些重装步兵可能感到支付六一税有辱身份，即使在实际场景中这笔上缴的数量并不具有压迫的色彩也是如此。难道现在他们自己不是军队的主人吗？

还有，在梭伦之后，此前落在六一汉身上的奴隶买卖现在落在了别人身上。这与民主的历史有两层关系。首先，梭伦在雅典创立了一个奴隶劳动阶层，从而显著而又实在地提高了公民的精英意识，以前公民自己或他们的祖先所从事的工作，现

在是由这些东西来做了（这是雅典人对奴隶的看法）。从心理上看，现在，小农与旧主人之间的共同点，比与代替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相同点更多。以后人们为公民资格设置了越来越多的壁垒，而在享有权利的团体内部，权利分派日趋公平，这一切是有力的诱因。其次，拥有奴隶之后，公民就有了参与政治讨论和担任官职的空暇，这为一种积极的政治生活，最终又为民主提供了便利（但要说是它使民主成为可能，那有些过分）。这一点所造成的影响，一直要到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才为人感觉到。

梭伦采取的严厉的政治改革，第一步就是扩大任职资格。梭伦之前的古代雅典是贵族制国家：只有良好的出身，才可能担任“执政官”（archon）或行政官员（magistrate）一类的职务。梭伦改变了这个规定或者说是习俗，代之按财富作为资格，全体公民按财富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第三级就是重装步兵，又叫“双牛级”（zeugites）。第四级也是最低的一级是古代驾驶船舰的“平民”（thetes）。

这远不是什么民主的呼声，后世的理论家把它叫做“金权政治”（timocracy），这个词来自 timai，它是一个表示财富统计额度的词。不过，这种政治却是一个起点：改变家庭出生在逻辑上毫无可能，因而要改变出生时归属的经济等级困难重重——但也仅此而已。

梭伦第二步引入了一个四百人议事会，它的职能大约是为公民大会（ekklesia）作各项预备。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公民大会的性质。《荷马史诗》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这些首领的辩论就在这里发生。《伊利亚特》中，有一个发言的人称首领应当是会发议论的演说家，会做事情的行动者（9，443）。（附带提及，今天人们认为，只有在公元前五世纪修辞辩论的技巧发展

以后，才有民主的出现，但上述那些段落否定了这种看法。虽然，在公元前五世纪修辞术只能说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在史诗描写的年代里，它还没有产生。）在史诗里，修辞术只是用于一种情形：一个普通人，具体到史诗中就是特尔西特斯（Thersites），被俄底修斯喝止，这迎来群众的欢呼。公元前600年时的雅典公民大会，论社会的代表程度，或者参与程度，较之《伊利亚特》的描写，不可能高出许多。

虽然古书里提供的梭伦议事会的细节，许多都是虚构，但不能由此怀疑他是否引入了这么一个议事会。它很可能由选举产生。到了这一世纪的结束，我们会看到，克利斯提尼用五百人议事会取而代之。对于这后一种制度，我们了解得比较充分：它在功能上不过沿袭前人，继承梭伦的传统。即使在梭伦的时代，四百人议事会也不是雅典人惟一的议事会；在公元前600年以前就有一个被称为“阿瑞奥帕戈”（Areopagus）的元老院，它一直持续到公元前三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不久民主政治寿终正寝的时候它依然存在。但眼下元老院是维护、而非破坏贵族特权的势力；四百人议事会的意义在于，无论它与公民大会是何关系，毕竟，它与公民大会有了某种关系。换言之，公民大会现在已经成为制度：它不再是遵照阿伽门农的吩咐举行会议，而与一个选举产生、规模不大的机构有了正式的关系；它或许还会受到这一机构的控制或主导，但这一机构的利益与永久保持贵族统治格格不入。诚然，这种说法模棱两可，不能让人满意，但与完全否认议事会的存在或者误以为四百人议事会事无巨细无所不为这两种极端的见解相比，无疑更可取。无论如何，议事会都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它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内容明确而且年代可考的政治革新。它是人们第一次具体的尝试，尝试在知识分子少数和大